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〇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五期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1b）

【往事追忆】	北京各大学的造反组织和活动	戴维堤
【难忘岁月】	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	梁守福
【童年旧事】	文革往事——一个普通人的回忆	水 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北京各大学的造反组织和活动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二月逆流”问题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迫害邓朴方，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红旗“按兵不动”。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写过反陶铸的大字报。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都不准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刚上台不久，求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喊出了“炮轰徐向前、叶剑英”的口号，并整过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错误行动都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 北航“革委会”成立

从大连回京后，韩爱晶等人建议我再度出山。他说：“北航红旗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江山不稳。”此话事出有因。

当时在有些人看来，北航红旗主要头头的家庭出身和老子们大都“不太高贵”。有的出身农民、市民，有的老子虽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地师厅局级）。有人的父母在当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有的历史问题未查清。北航红旗内外的一些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人和反对派议论纷纷，有人公开指责北航红旗是坏人掌权。韩爱晶等人为堵别人的嘴，建议我仍回红旗总勤务站。因为全院师生都知道，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讲出身，没人敢和我比。

我考虑再三，最后作出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我答应了韩爱晶等人的请求，又返回了北航红旗总勤务站，但未进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笔杆子也可以，韩爱晶等人让我负责北航红旗的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在北航体育馆先办了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参观的人很多，连聂荣臻元帅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来参观过，并表扬了我们。当时，《北航红旗》报和红旗广播站由常委们亲自抓，我没有介入。不久，常委们又让我负责组织保卫工作。

自从“一月夺权”后，反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北航事实上已经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权力。

北航革委会由45人（实43人）委员组成，常委9人（后增至13人）。后来陆续参加革委会的三结合干部有程九柯（原党委副书记）、张有瑛（原党委成员），王敬明（原副院长）、刁震川（原副院长）、王秀波（老干部）、肖汉祥（原武装部副部长）、梁兴德、陈翠蒂等。原党委书记王恒被“解放”后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的革委会分工如下：

革委会主任：韩爱晶

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会常委：韩爱晶、井岗山、仇北秦、田东、张有瑛（干部）、程九柯（干部）、屠海鹰、侯玉山、王洪发（教师）、李乐（工人）、杨瑞云（女）、刘德威、崔光极。（13人）

革委会委员（实43人）：刘德威、韩友民、邵重威、屠海鹰、匡正芳、刘春田、赵伦忠、刘崇勤、贾焕民、惠凤荣、田东、丰成伟、韩爱晶、王发动、侯玉山、康文彬、李明启、李乐、郝瑞、戴维堤、石兴国、罗钰源、李忠孝、宋光庆、仇北秦、莫世禹、张树泉、徐佛书、王文懋、杨瑞云、刘建华、井岗山、张聚恩、崔光极、黄铭钧、王惠民、黄文敏、张维彬、何麟书、王洪发、张有瑛、程九柯、陈翠蒂。

革委会主要部门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战部长：刘德威。下辖：红一连、钢一连、全国动态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后勤部长：莫世愚

宣传、组织、保卫部长：刘建华、李中孝、戴维堤

科研、生产、“红航一号”负责人：屠海鹰、李明启、何麟书等

斗批改专案组（刘天章连）负责人：刘祥

清队七人领导小组：井岗山、王恒、侯玉山、梁兴德、郝震武、戴维堤（还有一人，查询）。

红一连、钢铁纵队、全国动态组主要工作人员有：王以理、陆澄平、王守信、祝春生、段孔莹、柴孟贤、许志新、王端、万建中、朱之惠、杨玲玲、侯玉兰、尹聚平、王碧娟、王竹贤、卢向阳、左方成等。

清队办公室和组织保卫部主要工作人员（学生）：段孔莹、吕香孝、朱芒大、罗茂详、安英敏、陈霞、方学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红旗报》负责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

北航红旗原造反大队主要成员：刘向东（刘汉儒）、薛廷仁、宋毅、赵群增、戴经伦、苗洪仁、宫昌来、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改组。）

北航红旗广播站负责人：胡惠娟、郑德庆。

一系革委会主任：吕绍贤

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会主任：王发动

四系革委会主任：

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

六系革委会主任：宋光庆

七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会主任：张聚恩

（注：北航无八系。）

其他革委会委员无明确分工的，代表革委会协助和负责所在单位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毕业，我始终是43名革委会委员之一，虽然后来权力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还大，但始终不是常委。（注：多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时坚持说我是常委，受宠

若惊，谢谢！)

北航革委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邀请的首长和宾客很多。聂荣臻、肖华、杨成武等军界首长以及谢富治、吴法宪（代表空军）、戚本禹（未上主席台）和美国在华专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聂老师 and 将军们对北航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北京高校系统首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十分赞赏。这时的北航红旗，早已把国防科委当成了真正的上级，对聂老师和科委的领导们非常尊重。聂老师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界首长对“北航红旗”和北航革委会的工作十分支持，但严格要求，对北航红旗的错误也曾严厉批评。万没想到，后来肖华、杨、余、傅等军界首长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北航红旗”的黑后台和“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北航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三结合干部之一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已坐在主席台上，红旗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公函，头头们打开一看，是揭发程九柯在新疆监狱自首的所谓证明材料，并有单位公章。由于新疆监狱问题牵扯到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被害问题，事关重大，头头们不知所措。韩爱晶决定严格保密，会议照常进行。程九柯同志作为首批“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但不久，便被隔离审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关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为革委会委员，我先当了几天宣传部长，后来负责人事、组织、保卫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所谓组织工作主要是“北航红旗”成员的管理。历史的事实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保留，让他们继续负责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很少过问，只有重大问题和报告才请我签个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大都是反对北航红旗观点的，但我对他们毫无派性，更没有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想到数年之后抓“5.16”运动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师“恩将仇报”，几乎把北航红旗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对此，我万分遗憾。

当时各系和基层革委会的头头们，由选举产生，谁上谁下我无权干涉。学院的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对象的专案审查和批判，由“刘天章”连和常委们亲自抓，我无权介入。对外作战由常委和“作战部”（下属“红一连”、“钢一连”等）管。唯有保卫部，我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声不好的“红旗造反大队”解散，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学生，成立了“红武连”，后来扩大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掌管着中央发给的数千枝枪，我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建华、李忠孝共同负责。后来刘、李二人毕业，组织保卫工作由我一人负责。这样，从生孩子报户口、两口子闹离婚、人事调动、调整住房、财务报销、处理自杀事件、站岗、巡逻、护校，一直到调动“红旗武装部队”都由我管。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对这些日常琐事不屑一顾，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打破过一块玻璃，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我必须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虽然没打破一块玻璃，但像当时所有单位的造反派一样，北航红旗掌权后尤其是“清队”中也打击、误伤了一些干部群众，并批斗过彭德怀等人，打死了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犯了许多错误，详情后述。

◇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说起谭厚兰，许多人对她知之不多。谭厚兰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1940年，她中学毕业后先当过教师和小学校长，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文革开始时，

她已26岁，比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大。

谭厚兰同《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较熟，小道消息灵。文革之初，谭厚兰也因反工作组“起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但影响和名声不大，没有什么“伟大壮举”。聂元梓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板”；蒯大富有“绝食、卧轨”反工作组、反刘少奇、王光美和周总理亲自为其平反等名气；韩爱晶有“28天28夜”静坐示威揪工作组“壮举”；王大宾有“四进地质部”揪工作队“战功”。惟独谭厚兰，造反业绩欠佳，名声不大，于是她想干点出名的大事，向其他学生领袖们看齐。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谭厚兰在全国首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和声讨，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谭厚兰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1966年10月，在戚本禹等人指使下，谭厚兰决定到山东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笔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尊崇，成为“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泰民安立了大功，也为炎黄子孙的做人之道、处世哲学立下了规范。总的说来，儒家学说的功劳大大的，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学说也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儒家学说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随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准革命造反的正统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如今的落后，尤其是人们思想的保守落后与儒家学说不无关系。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会的变革。

历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运动以来，以鲁迅等人为首的文化先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主张“反孔”的。

笔者认为，不论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应讲道理，都应以理服人。对于“孔家店”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的重点文物，是国宝，是中国人共有的财富，理应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过教师又是文化人的谭厚兰可能仅记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反动言论”，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决心要砸烂“孔家店”。1966年10月7日，谭厚兰放着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放着北师大的“黑帮”们不斗，带领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二百名学生杀往曲阜，不顾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联了当地一批学生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彻底砸烂孔家店誓师大会”，然后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国务院于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捣毁，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捣烂，孔坟被刨平，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数千册古书，数百轴字画付之一炬。整个孔庙、孔林被洗劫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

好一个“巾帼英雄”谭厚兰，真了不起！

谭厚兰带人砸孔庙的事，我和韩爱晶后来才听说。作为山东人，齐鲁子孙，我非常气愤。不是事后诸葛亮，若我当时是山东或曲阜的共产党官员或造反派头头，我不会让谭厚兰胡作非

为的，因为我特孝敬祖宗，喜欢文物。山东老乡当时连祖宗的遗产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谭厚兰这算什么本事？这是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干的事。”韩爱晶也对谭厚兰嗤之以鼻。

谭厚兰自持有后台，不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挑动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反对派，这使她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蒯大富和韩爱晶时刻想着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

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师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了第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个老师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小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

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小姐因为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小姐既是帅府“千金”，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1972年，凌子小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1966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宾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一些坏事，包括批斗过彭德怀等。

◇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

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1966年“8.18”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4.14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7机部（现在的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骂。当时，《北航红旗报》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报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报。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清华“4.14”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关系密切，“4.14”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材料上报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十七年的基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4.14”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握的“白骨精”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是一丘之貉，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经常阴阳怪气地责怪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老贼。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垮。谭厚兰同王大宾和清华“4. 1 4”打得火热，对“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 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死对头清华“4. 1 4”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桶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个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

计王大宾可能是嫌韩爱晶没有出面，故意避而不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如果这次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没有武斗，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7.28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占领。这样，文革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又是我的一家之言。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一样，由于有最高层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2004年4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全国抓“516”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清华“4.14”可能例外），这话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

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注：这些口号只能适用于文革中。）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幅标语，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清华“4.14”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天、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的确不是一个好女人，尤其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其罪行十分严重，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逻辑。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是“大女流氓”，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两口子吵架，什么脏话都可能出口。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吴德也好，谢静宜也好，说什么都行。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但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1993年的口述回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

~~~~~

## 【难忘岁月】

### 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第五章 惊涛裂岸（续zk0810c：“三天流血事件”）

### 二．省委后院起火

“三天流血事件”就发生在省委大院里，许多机关干部就住在大院或附近。“三天流血事件”的全过程他们看得最清，不需要向他们宣传是和非，经过几天的思想酝酿，一场批判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焰燃烧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为首的17名省、厅、处级干部联合发表《紧急呼吁》。在“呼吁书”中明确指出：“以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狰狞面目”。并提醒机关干部“再不起来同革命小将、工人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就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向党中央交待、向安徽三千万人民交待，也无法对待自己的革命责任心了。”

十二月八日，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张永哲，又给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文化革命办公室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希望省直机关干部“勇敢站出来投入战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省直机关干部在“呼吁书”和“公开信”的影响下，纷纷起来造反。省交通厅、省劳动局、《安徽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联等几乎都先后成立革命造反组织，而且以极为迅速的态势发展着。这时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断裂了，省委的权力意志再也难以通过原有的权力体系运转了。

### 三．党中央做出明确反应

“三天流血事件”的前一天，即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礼堂接见了“八·二七”代表，谢富治说：“前次（指十一月十二日的接见）我们有些情况还不够清楚，还不大敢讲呢。……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同时，刘宁一为“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命名。

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23时至十七日凌晨1点，也就是“三天流血事件”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再次接见“八·二七”的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

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也就是流血事件的第三天，谢富治、刘宁一又一次接见“八·二七”代表。他不仅肯定受伤学生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明确指出：“他们（指安徽省委）如果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样干，不是一般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是错上加错！退一万步，也是省委错误路线的结果”。并严厉地指出：“这是罪恶！”

“三天流血事件”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送到北京治疗的伤员，周恩来指示：“要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结果伤员全部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直到六七年元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在京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时，还批评李葆华：“打人总是不好！”

### 四．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应运而生

“三天流血事件”之后，“向英雄的‘八·二七’学习！”、“向英雄的‘八·二七’致敬！”、“‘八·二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颂扬“八·二七”的标语到处皆是。“八·二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八·二七”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名声大振。全省各地的学生造反组织都想借用“八·二七”这面大旗，原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称呼太小了。我们感到太小，连当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也感到太小。其实，早在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就说：“合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名字太小，应该改成‘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并当场题了字。“三天流血事件”后，将原“合肥市‘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改称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经过各高校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将合肥各高校原名称取消，统一冠以“八·二七”的名称，外地区的革命造反组织也更名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某某分团”。这样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的造反组织，统称“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组织原则依然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各级领导，再由各学校负责人推选兵团负责人。“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依然保留，

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决策相对集中。“八·二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面大、较为分散，统一决策、统一指挥，比较困难，容易形成分散主义。保留“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作为安徽“八·二七”的核心组织。由我身兼两职，便于协调统一。刘光裕、李胜利、李文安本来就是“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常委。基于上述考虑，我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总指挥职务依然保留，同时兼任“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政委，推选工大的刘光裕为“八·二七兵团”总指挥，工大的李胜利、工学院的李文安为副总指挥，安徽大学的吴波为副政委。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办公地点设在省政协。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意味安徽省学生造反派走向联合，肩负起新的斗争使命。

## 五．省委领导人东躲西藏

由于“三天流血事件”唤起机关干部纷纷造反，省委失去行使权力的基础。省委常委及书记处若干人也是东躲西藏，四离五散。第一书记李葆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离开稻香楼，住进省军区。李葆华虽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那是军区必须接受地方党组织一元化的领导。李葆华并不直接参与省军区的日常军务领导，按中央军委通知，军区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的通知精神，李葆华不能长时间在军区滞留，所以李葆华很快又从省军区转移到离合肥不远的肥东县。“三天流血事件”期间，他不敢正面接触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而是用放录音的办法制止事态的发展。事实证明，此方法没有效果。不知为什么，他好像感到肥东也不安全，随后又躲到舒城县的晓天镇。十二月下旬陶铸要张恺帆找李葆华到北京，也是几经周折在晓天找到的。这说明省委书记间的经常联系已经中断。

省长黄岩在“八·二七”事件后，就很少出面，据说“三天流血事件”前，黄岩就跑到皖南郎溪县的某个农场躲起来了。

省委书记李世农因身体不好长期养病。

省委书记任质斌在北京解决被打伤的学生问题。

省委书记张恺帆因负责文革接待工作，他经常同群众见面，但孤掌难鸣。十二月下旬他随合肥“工联会”上访团到北京。

省委书记王光宇在“三天流血事件”时露个面，说了几句不解决问题的话。“三天流血事件”后，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省委常委王中和朱光“三天流血事件”后，在北京养病。

省委常委李凡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李葆华点名批判。

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三天流血事件”后，省委的领导班子自己把自己肢解了。

## 六．工人、市民造反风起云涌

由于省委领导主要成员四处躲藏。省直机关干部公开起来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环境为广大的民众起来造反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是工厂的工人起来了，除了“合肥市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以外，各企业自身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类造反组织。原有的保守组织也因失去省委的支持而自行解体。多数都是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一边。基层群众的一边倒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失权，这种形势类似原子弹的链式反应。到了十二月中旬省暨合肥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瘫痪。十二月底，合肥晚报社印刷厂革命造反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的管理权。这是安徽省第一家夺权单位。由于基层党组织的瘫痪，企业又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造反组织必须接管企业的管理权。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月中旬，合肥市的厂、矿企业有90%左右都由工人造反组织接管。

省委离散了，群众造反了，但省委推行的错误路线并没有系统地揭发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八·二七”不能笑看“山花烂漫”，必须对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做争取工作，只有领导干部站出来，才能揭开省委的盖子。因此，争取省委领导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成为“八·二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场攻坚战，攻心战。

“三天流血事件”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突发性。从本质上说。两股相撞的思潮都是对共产党的忠诚，只是忠诚的具体目标不同罢了。因而不能说参与“三天流血事件”的人都是坏人。再者，“三天流血”也没有李葆华如何调动工人打学生的直接证据。连“八·二七”事件那样的证据都找不到。虽然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三天流血”后，公开表示对“八·二七”的同情，但由于身体不好，能力不强，一直不受重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我们把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张恺帆身上。我记得“三天流血事件”前，有一次和张的单独接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揭发省委，揭发李葆华？如果你是怕人身安全问题，“八·二七”可以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张说：“我们省委是一个领导集体，我不能像你们那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保守组织提出：“打倒张恺帆！”时，我们只给张恺帆一个警告性的口号：“张恺帆，你再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砸烂你的狗头！”从当时张恺帆的内心深处来看，他也很无奈，只好“穷应付。”

“三天流血事件”后受围攻的领导干部还有张祚荫。他虽然是副省长，但不是省委常委。我们在他身上一直未花太多的功夫，加之《解放军报》记者的话“听其言，观其行”的忠告，对张祚荫更不想多花功夫。

就在我们苦于找不到攻打安徽省委这个堡垒的突破口时，另一种力量悄悄地在影响我和“八·二七”兵团，他就是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传递李葆华一九六二年来到安徽后刮“两风”（翻案风，黑暗风）的材料。因为“单干风”是曾希圣在安徽干的，李葆华来后纠正的，所以给我们的材料主要是“两风”。根据这些材料，“八·二七”利用其宣传工具《安徽八·二七》报，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某些省份，大量的、较为系统地揭发省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揭发对六二年被平反的干部形成一定压力。张恺帆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安徽文化大革命从“三天流血事件”以后，由于机关干部的造反，不知不觉地将安徽干部间的宗派斗争引入文化大革命。

就在省委已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明确要求对前一段犯了错误的各级领导必须“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并具体要求他们：“一，诚肯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做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群众，实行真正平反；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等五项具体要求。安徽省委不但没有按照《红旗》社论的要求做工作，相反，在省委大院内连续发生了“三天流血事件”，而伤员又被送到北京治疗，这无疑加重了省委错误的分量。使得中央部分领导对“八·二七”表示支持。从十一月十二日到二十日的八天之内，先后四次接见“八·二七”在京的代表，并明确批评省委的路线错误。

由于省委没有认真做好受蒙蔽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工作，结果，在“三天流血事件”之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张洼公社围攻学生，并打伤数人的事件；接着，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长淮电影院又发生了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对省委来说，不管与他们的动机是否有关，无疑都是错上加错。

## 七. 我的北京之行

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不见了李葆华，也看到不了张恺帆，安徽几乎处于权力真空，后来知道他们在北京。有一天李文安向我建议：我们是不是派几个人到北京去一趟，还得要李葆华公开检讨。只为这件事去北京没有必要，我主要考虑省委瘫痪，无人主持工作，全省的生产，生活怎么办？加上我也想到北京看看形势，有机会将我们整理的李葆华在安徽推行错误路线的材料送给中央，找陶铸辩论，他为什么听了一面之词，就乱发指示，造成“三天流血事件”。顺便看看“工联会”的在京人员，希望他们早些回合肥。我和李文安，还有“工联会”的梁兴亚决定到北京去一趟。由于随身带有许多重要材料，不敢坐火车，决定从省体委借一辆轿车，另外，由合师院讲师汤志浩领导的合肥地区“红卫军”还搞了一辆苏式吉普车，同我们一道去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发，因北去路上雪大汽车不能开，到济南后，车子丢在济南车站（该车后由省体委另外去人开回），我们转火车，直到元月三日才到北京。

我们到了北京后，由于“八·二七”驻北京联络站设在北师大，就往北京师范大学奔，到达北师大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和李文安一进师大的大门，就看到在大门内侧停一辆卡车，车上站的正是李葆华，穿一件绿色军用棉大衣，头上戴一顶厚厚的棉帽子，面前挂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写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李葆华”三个字都用红笔划了圈圈，打了叉。我当时就问安工宣传队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宣传队的同学解释说：“组织这次游街不是以‘八·二七’为主，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这是以北师大和其他高校红卫兵司令部为主。游斗李葆华一是表示北京红卫兵对‘八·二七’的支持，二是因为李葆华在北京工作多年，这样游斗一下，可以肃清他的思想流毒，也可杀杀他的威风”。听了他们说的理由，我们刚到，又不是“八·二七”组织的，只有服从。就这样，我们也跟在汽车的后面，由北师大出发，进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到了天安门，天已黑透，借着灯光可以看到李葆华被冻得鼻涕拖得老长。这时我想得很多，昨日的省委第一书记，风光十足，安徽的李“青天”，今天落到这步田地，真可谓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由原来对他的气愤，反过来又有几分同情。我想到我将来会如何？一路上我只顾想问题，不知不觉到了中南海西门。因为六六年九月份，我到过这里送过材料，有印象。车上的喇叭叫陶铸出来对质，喊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直到元月九日左右，得知李葆华住在北京饭店。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清华串联队的）在北京饭店找到李葆华。张恺帆也在那里，还有三个秘书，其中一个叫胡松涛，是省公安厅派的秘书。见到他们以后，当时住地很乱，很多安徽人，特别是蚌埠、怀远一带的农民，他们也打着某某造反司令部的名义找省委批钱。张恺帆被他们搞得没办法。我和李文安商量一下，由我们出面处理。当时中央已下发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并在报纸上广泛宣传，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干？我和李文安、戴勤发三人顶到了第一线。我们先亮出“八·二七”的牌子，再宣传中央的政策，要他们回到本地区解决问题，不可直接到北京来要钱，大家都这么做，不就乱套了吗？另外告诉他们，以前省委任何人批的都不算数，都得听中央的。这一番话是李文安说的，口气非常硬。外地人不认识我们，还在吵，这时李文安把我抬出来了：“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全国有名的梁守福。”李文安这一手很有用，围在走廊里的人一下子不吵了。这时我用比较缓和的语气做些工作，人退走了。一个下午，加上晚上，一共应付好几批，晚饭是秘书给我们弄的。当天晚上，我们和李葆华、张恺帆坐在一起聊天，张恺帆说：“你们早几天来就好了，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来，我还不知道被他们围到什么时候呢？”张恺帆为了缓和气氛，还问了我们的年龄，而且告诉我们，他比李葆华大两岁，他五十九岁，李葆华五十七岁。李葆华话不多，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来意。我让李文安告诉他们，我们是想让他们回去，一面接受群众批判，一面还要工作。省委已经瘫痪，你们老在北京，省里出问题，责任还是你们的。这时李葆华说：“我们也准备这两天就回去，但周总理还准备接见我们，做做工作。”这时我说：“你们老这样接待批钱也不是办法，不如找个地方躲几天再说。”张恺帆同意这个办法，他们准备搬到香山饭店去，这个地方离市区远，一般人找不到。我们商量好后，我还补充了一句：“你们一定保密。”当晚因太迟，没有走，我们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大约元月十二日，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来到香山饭店。这次我们没有睡地毯，而是给我们三人开了一个房间。平时吃饭，他们吃的是省委干部的伙食标准，而我们吃得是七角钱的伙食标准，两个伙食标准的饭菜悬殊很大。有一次晚饭后，我和李文安与张恺帆走在路上，张小声说：“你们的生活太差了，我想给你们点补助，用我自己的工资”。我们回答说：“这比学校里的伙食好多了，谢谢你的好意”。

元月十四日接到中央的通知，说晚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在京的各大军区、省军区、省委常委以上的负责同志。李文安说：“我们也去试试”。结果我和李文安也去了，但到门口，胡松涛主动介绍我是造反派司令，被门卫拦下。但后来听说，会议开始后，还出了个笑话，王中告诉周总理，安徽还有个司令没进来。周总理说：“快请他进来”。后来有人说，是造反派司令，周总理笑着说：“那就算了，今天的会与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一直等到大约十五日凌晨三、四点，他们才回来。我们问张恺帆接见的內容，张说：“今晚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林没说什么话，主要是周总理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的问题。对李葆华批评得比较厉害，要他立即回安徽接受群众批判。同时，还要把安徽的工作抓起来。批评了“三天流血事件”打伤这么多人不好。

我在北京期间和李葆华的接触以后成了反夺权的程明远在周总理面前说我“被李葆华收买了”，“搞修了”的口实。

元月十五日决定由李文安、戴勤发和李葆华、张恺帆等人坐飞机到南京，再由安工派车到南京将李葆华、张恺帆接到安工住下。我因听说元月十八日，周总理接见各省、市在京的造反派头头，留下未走，又到北师大同宣传队同学住在一起。后来听说原定十八日接见改期，何时接见另行通知。我于十八日同安工宣传队一起回安徽。其实我们在离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在北京体育馆，接见了在京的安徽群众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在蚌埠转车时，看到蚌埠许多基层干部几乎是排着队，戴着高帽子，有的嘴里还咬着稻草，胸前挂个大牌子。这牌子各式各样，有的甚至是钢板做的。因为游街的人太多，他们也不以为然，有的还在笑。我看到后，非常气愤地对宣传队的人说：“太过分，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丑化成儿戏，有气出一下可以理解，老是这样游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当时宣传队的同学很同意我的看法。当我回到合肥后，情况好一些。但也几乎成为一种时风，谁的一两句话也阻挡不住。

~~~~~

【童年旧事】

文革往事——一个普通人的回忆

• 水 城 •

我是文革前两年出生的，对最初的疯狂已没有任何印象，只听家人偶尔提起当时造反派冲进我爷爷家，两岁的我吓得躲在桌子下不敢出来。后来我也随爷爷奶奶被揪至居委会批斗，我一边哭一边扯着奶奶的裤子要回家，但他们不让。据说搞了五个多小时，后来回家时已经睡着了。还有一些关于文革早期我家受到冲击的细节来自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们家占住着我们家的房产）。他从大人那里听说了我们家的一些事，就常常在班上嚷嚷我们家是剥削阶级（也就是开店雇了几个伙计，并做些房地产出租生意），文革中被游街批斗，还有我年逾七旬的曾祖母被戴上高帽坐在垃圾车上示众，云云。每每此时，一帮男生开始起哄，女生们面露鄙夷，使我这个三好生、班干部在同学老师面前脸面全无。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在我后面一边叫骂，一边

朝我丢石子。我惶恐不堪，痛苦绝望，真希望地下裂开一个洞让我立刻钻进去。我甚至希望从来没有出生在如此家庭，并幻想着也有同学小玲那样的红色家庭出生。

由于祖父母家受到冲击，我母亲把我接到她下放的林场。那是一九六七年以后，我开始有记忆和知觉了。对文革最早的记忆是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三岁的我都能朗朗唱诵，现在还能记得象《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其次是忠字舞，大游行，忆苦饭，批斗会。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公审大会上有几个挨斗人士人比较倔，全身五花大绑，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抬起来，惹得众人恼怒，振臂高呼“打倒”。最搞笑的是有个造反派头头，在台上起劲地带头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毛主席万岁”等等，谁知一不小心错喊了“打倒毛……”，还没等他喊完，就被人五花大绑按在台上批斗，演出了一场黑色幽默闹剧。其间也不断听到自杀的事，比如一天有人匆匆到林场来告诉我们那天早上某个厕所里吊死一个人，等。而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有一次跟一帮人跑去酒厂边的酒糟池看死人的事。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整齐地穿着一身藏青的中山装，脸色发紫，尸体漂浮在黑色的池水上。据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在林场那几年是我懵懂成长的时期，因此有些当时微小的事情对日后的我起着很大的影响。我母亲常常出差下乡，就是不出差的时候也常常不分昼夜、周末节假日地得参加政治学习、批判检查等，我们便由保姆带着。有一个保姆，我们管叫“奶奶”的最有意思。她尽管出生卑微，却在北京等大城市给干部家做过保姆，见过大世面。她会讲《劈山救母》、《螺丝姑娘》、《七仙女下凡》等神话故事，听得我津津有味、心驰神往，在母亲缺席的无数夜晚给了我们带来无比的温暖和亲情，并在文革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温馨的人文种子。那时林场有好几个劳改右派，在众人眼里属于贱民，任骂任打，不回手不作声，好比骡马（当然多年后得知他们都是非常能干、非常有学问的人）。有一个繁星点点的夏夜，妈妈去开会，我又缠着“奶奶”讲百听不厌的神话故事，这时有个右派走过，看我如此当真老太太的故事，左问右问，刨根刨底，平时沉默寡言的他忍不住说了句“这些封资修的东西都是假的”。我顿时被震惊了：一，我没想到他会说话，在我眼里他们是隐身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我没想到他胆敢说话，我所受的教育是他们是罪犯，罪犯是不可以自动说话的；三，他居然断然否定了我的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向往。这以后我有些失落，总觉得缺点什么，歌里唱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怎么也无法抹去母亲常常不在身边的伤感，可以说这是我最早的对共产党的疑惑。我就此问母亲，而母亲总是很紧张，频频告诫我不许乱说话，还讲了很多小孩不懂事乱说话，父母全家被定罪的事情。

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加上小地方的极端愚昧，母亲面临巨大的压力，造反派几次三番要整她，并到杭州、上海外调她的家庭成份，开批判会，写检查，甚至有一次几乎被乡里来的造反派抓走打死。我母亲担心年幼的我们的安全，也考虑到快到学龄的我们的教育问题，于七零年后把我们送回城里。我到上海父亲工作的学院呆了一两年，看到一些大城市高校的文革情况。首先是教师常常到农村干校改造，一去几个月。就在我到我爸学校不久，爸就把我托给了一家工友，他自己到安徽凤阳——朱元璋的老家，大名鼎鼎的穷地方——种地养猪去了。我到了陌生的工友家感到非常不适应，整天度日如年。那时工友的大儿子正好在上海过年，他在新疆兵团插队已有好几年了。平时看到我们小孩也不搭理，总是沉着一张脸，常常坐在马桶上闷想（现在我回想起来，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后来假期结束了，他必需回兵团，临近动身那阵他越来越烦躁，一拖还想再拖。最后躲不过了，我们一起去上海火车站为他送行。记得那天的上海站都是知青回乡的场景，哭声一片，车上车下拉着手久久不愿分开。工友的大儿子站在月台上，也不说话，也不挪步，急得我怕他误了火车，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上了车。

父亲从干校回来后，赶上了老毛的大学要改革（合并撤销，搬迁内地），父亲的学校和上海另一所高校合并，我们遂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角落。在父亲上班时我在校园里到处乱转，有时也

挤在成人后面看大字报，当然也看不懂，只是凑个热闹。父亲和母亲一样，在文革中都是逍遥派，都是老实的读书人，也没那折腾的本事。当时父亲正忙着搞部里的一个项目（好久后得知是长征火箭的导航系统），系里让他写文章揭发批判同事他没干，不曾想没过几天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校园，说他是冷血动物、白专道路。校园里有一道风景，是三个著名的疯子，都是文革大批斗给整的，成天神神叨叨，疯疯癫癫，是小孩们恶作剧的对象。我们楼里就有一个，成天苦思冥想，在老旧楼道的木地板上急速地踱过来又踱过去，从早到晚只听到他咄咄的脚步声。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是我母亲家的亲戚，是个大才子，文革中太傲气不肯曲就，被逼出了神经病。楼道的另一头住着我爸的同事，解放前留德的薛教授，那会也是被批得一塌糊涂，看上去一副可怜的老头样。我爸和他关系不错，对他挺尊重，而我却常常去他那儿拿他的酱油青豆吃。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工农兵，基础极差，有时晚上还跑到我们宿舍问问题，一呆呆到十点以后。我爸跟本是对牛弹琴，这些人多数微积分没学过，有的甚至解析几何也没学过，只读到初一、初二，想学大学的物理光学，简直就是开玩笑。可我爸得陪着哄着，不然第二天又是一顿狠批猛斗。我在旁边困得不行，可他们赖在我们八平方米斗室唯一可坐的一张床上，我没法睡，常常等得不耐烦。我爸一遍遍地讲不通，最后提议明天给他们补上微积分才算把他们打发走。现在想想，这些还是工农兵学员里要学的好学生，那些不好的不知写了多少大字报，不知整了多少教师呢。

在父亲的校园里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就是小红了。小红比我小几岁，家里山东人，那阵她和弟弟妈妈在她当体育教师的爸爸那里探亲。小红非常可爱漂亮，白里透红的皮肤，带点黄的卷发和眼睛，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每次我们一起玩，大人总是逗她而不理我，我还挺嫉妒她。我们常去学校的游泳池，他爸爸是教练，精干健壮，随和亲切，人们总爱开玩笑地说游泳池旁边图书馆里那本一两百斤的大书在等他去搬。那时小红爸爸和我爸一样正想办法调回老家和家人团聚，谁知在他刚要调走的前夕，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事后听说是在厕所贴反动标语。我很震惊，很难想象小红爸爸那样的好人能干反动的事，也很难过小红失去父亲。那时我妈上海的亲戚也都在关押受审，我外公四个兄弟姐妹不是资本家就是旧社会的白领，而外公和他弟弟的情况尤其糟糕，尽管是出于截然相反的原因。外公抗战初期随国民党的医院逃到了云南，而小外公和中央大学的同学，包括陆定一的妻子，投奔了延安，并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选择了离开，回上海接过老爷子的绸厂当起了“红色资本家”。文革中这些历史可以罗列一大堆罪名，于是又是抄家，又是关牛棚，折腾了好些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爸冒着风险，常常带了水果糕点去看外公，等后来被放出来后反不大去了，但外公总是会说起爸爸的忠厚。

爸爸对文革早有看法，有次妈妈来上海探亲，爸爸从系里开会回来，很不开心，沉沉地对墙上老毛的象瞪了一眼，面露愠色地说：“毛是个倔头”。妈妈马上拽住他的手紧张地说这话说不得，要坐牢的。还有一次，我正唱着流行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爸从外面进来，一听就火了，“什么就是好就是好呀好，跟吵架似的”。

由于爸爸工作太忙，奶奶提前退休带我们，这样我又回了杭州爷爷奶奶家。这时已是文革后期，最惨烈的时期已过去，爷爷奶奶也不再被批斗了，但仍是被邻里改造的对象。街道在老毛“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强行在我们家的客厅挖了一个“防空洞”，据说全墙门几十户人家在空袭时要在那里避难。那个洞不大，只能装七、八个人，除了给我们家带来不便，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他们不让我们填，谁让我们是整个墙门最软的柿子呢，这附近三、四个墙门都是我们的房产，但被几十户人家占着，背了个剥削阶级的恶名，近乎任人宰割。整片房产中留给我们自住的是连接两个墙门的几间屋子，而这儿成了两边的通道，人们不去外面穿行，非要走我们的客堂，加上下面的“防空洞”，那几片架在上面的木板摇来晃去，翘上跌下，不是让我们摔跤，就是成天吱嘎作响，使我们不得安宁。更有甚者，一个墙门后园的井水比另一个墙门的清，那边的人家都来提水，又抄近路走我家客堂，把我们可怜的木地板洒得烂湿，害得我八十岁的曾祖母跌断了腿，瘫在了椅子上。我那脾气暴躁的大堂姑跟来人吵起来，那人是以前我们

店的伙计，是曾祖父把他从农村里带出来做学徒，住在我们的房子里，文革中和另几个同乡伙计合起来斗我们家，控诉我们剥削他们。他看堂姑这黑五类的狗崽子竟敢和他吵，遂一顿连头带脑暴打，十三岁的堂姑撂下了严重精神分裂症。我回老家读小学时堂姑他爸，也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刚从农村监督劳改中溜回城里，没有正式工作，靠私拉粪车过活。他是那种憋不住的大嘴巴，文革中讲了几句讽刺共产党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依法逮捕，开除工作，押送农村劳改。在这关键时刻，他老婆跟他划清界线，撇下三个十岁不到的女儿，离婚走了。三个女儿靠祖母、大伯接济，勉强度日，而老大不久又成了疯子。那时闹上山下乡，老二成天东躲西藏，最后还是被弄去插队了。老三则成天和老爷子吵，一把鼻涕一把泪，怨他把她们害苦了。那年月出生成份成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城还有一户亲戚，老头也刚从青海劳改回来，他是受其堂兄连累，进的监狱。他弟弟是国民党总统府的，五零年和后来的国民党代总统严家淦潜回大陆，和老头见过面。等他们一走，共产党发现了，立刻把老头抓起来，判刑流放，在青海呆了二十几年，五个孩子四个插队（老大没赶上），两个黑龙江，读书很好的他们一个没能上大学。老头回来时，风声已没那么紧，两家牛鬼蛇神又开始走动。记得去他们家吃饭，邻居大妈一举一动都监视着。共产党这时频频来找老头，要他帮忙搞统战，老头一口咬定和台湾没联系，死活不肯帮忙。

日子就这样在惶惑、无耐和艰难中渡过。转眼到了七二年夏季，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夏天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共产党铁的统治发出了第一声裂响，我们也第一次有所醒悟。那个夏天传来天大的消息，林彪政变败露、叛国出逃，最后跌死蒙古温都尔汗。这就象一声炸雷，把中国老百姓从洗脑的梦靥中惊醒：呵，林副主席啊，毛万岁身边的千岁爷，最最忠心最最革命的接班人啊，怎地，成了野心家阴谋家？！那毛爹爹和共爷爷就不是英明伟大的了？什么，人家早看出来了，只是让他尽情表演，可以暴露彻底？至于吗，这样玩也太悬了，这是糊弄谁呀，连我们小孩子都看出来啦！这以后，老百姓开始私下纷纷议论国家大事，其中不乏对共产党的不满。我受林彪事件刺激很大，好像突然长大，开始思考了。平时喜欢听大人的议论，在班上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讨论，对四人帮之流的造反派很反感，对国家忧心忡忡。好同学修娴有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爸爸，个子高大魁梧，性格爽朗温和，复员后在邮局当邮递员。尽管学问不高，可爱好文学，善写文章和诗歌，也爱讨论时事政治，很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修娴在他爸爸的熏陶下也是文彩不凡，针砭时弊，我们两遂成了班里少数几个铁杆“异议人士”。同班另一同学小玲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祖上是贫农，父母是工人阶级，当时她爸靠造反起家，成了我们上城区的领导，民兵指挥部的部长。小玲那时是春风得意，志高气昂，新衣服一套接一套，灯芯戎，开丝米，泡泡纱，家里也是又盖房又添家具，吃得也好，每次我去她家看到总有肉吃，而我们那时定量每月每人只有四两肉。小玲常到班上炫耀：“啊，我爸爸昨天又拿着大刀上城隍山武斗啦，把三下派打个大败”，“我们家修了个地道，直通城隍山”，“啊，昨天我和我爸去迎接尼克松啦，还见到周总理了呐！”听得小朋友们个个眼热得不行——小玲家大人物啊！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小玲爸受到了整肃，并下放到造纸厂劳动改造，穿了破衣服踏个三轮车运纸板，后面老跟着小孩取笑、扔石头。小玲家的两套新家具也被运走了，最后搬出了添盖了好几间屋子的墙门，搬到另一巷子的小房子住。若干年后再见小玲，已不再是穿着新潮、牛逼烘烘的她了，那时她爸已经肝癌过世，她只是津津乐道在哪能买便宜货了。这是后话，但让人感叹世事无常，真所谓“风水轮着转”哪！

林彪倒台后，又刮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厌倦不断的政治运动，墙上竟出现“批零批空”这样的标语。学校让我们写大批判文章，我们小学生懂个屁，就成天抄报纸。还有就是捧“红楼”，贬“水浒”，我们小孩不知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禁了那么久，终于有好书看了，便到处借来阅读。但成年累月的运动，生产被严重耽搁，国民经济一塌糊涂，物资极其短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一个月只有几两糖、油、肉、棉等，还总是缺货。多少年后，甚至直到现在，在买食品时会短暂地惶惑忘了带粮票，就因为有一次和小朋友好不容易凑足了人民币去小店买桃酥，却被告知没粮票不能买，眼睁睁望着香喷喷、油酥

酥的桃酥饼而只有添口水的份。有一阵堂堂江南鱼米之乡、人间天堂，大米不够供应，要掺杂粮。街头小菜场来点臭鱼烂虾，大家天不亮就要排队到巷口，还总为插队走后门这类事吵个不停，甚至大打出手。就在全中国人民半饱不饱、脸色菜黄之际，电影院里仅有的几个记录片还老放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是文艺演出又是美女鲜花，身边那个漂亮的法国混血三老婆不够用，还向上海芭蕾舞团跳白毛女的MM求婚，把我们老百姓气得够呛。印象最深的是花花公子西哈去新疆访问，白雪覆盖的地上，红地毯一直铺到毡包里，一个一百斤的大西瓜被切开，红瓤黑子，看得我们直流口水。那时候老毛要输出革命，于是我们勒紧裤带拿东西贿赂第三世界，“打肿脸充胖子”。尼克松来访那会儿，市政府跟变把戏式的，从各地搞来一大堆东西，把杭州最大的龙翔桥菜场布置得琳琅满目，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应俱全。周围的居民区挑出可靠的居民，操练到菜市场购物。老尼到的当天，每人到柜台拿个鸡鸭什么的，在菜场走一圈，拍了照录了象，从后门出去把鸡鸭鱼肉原封不动还给菜场。老尼一走，这批鸡鸭整个运走，连根毛也没见，杭州人盼借老尼访华的光肚里添点油的希望彻底落空，那个骂呀。

此时到处怨声载道，老百姓胆大的就在街头巷尾大声地表达不满了，而城隍山则成了非官方的市民议政中心。转眼到了七六年，朱、周一死，接着唐山大地震，老人说是异象，要变天。果然，九月份老毛归天，我暗叹一个时代结束了。追悼会上让大家放开哭，我心软，也和着大伙一起抽泣，偷看修娴，根本就是干嚎，没一滴眼泪不说，咋看咋象开心样。老毛一死，老毛遗孀一伙更加猖狂，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正焦虑处，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顿时那个开心啊，尽管开始还不敢公开讨论，但满街的大字报看得过瘾。就这样文革结束了，中国从愚昧的中世纪走了出来，走到了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中国最黑暗的时期算是结束了，但我也和许多人一样留下了后遗症——政治冷漠。我开始怀疑人性本是恶的，而文化大革命只是给了个机会让人性中的丑恶得到了充份体现。进入中学后只管读书，不问政治，离党团组织远远的，不仅三、六下午政治学习缺席，连政治课也常常逃课，一听马列毛那一套就反感，课堂上讲话打岔或看小说睡觉，考试时一反常态，拿出书来抄，公开作弊。这样高考政治得了六十分，是最低的一门课。大学里也是故态萌发，牢骚满满、玩世不恭，到考研时还叫嚷取消政治考试，当然多半也是因此落榜。后来经历了八六、八九民运，可以说彻底灰心，遂踏上了赴美的旅途。来美头几年还常常作恶梦，梦中自己还被困在国内那种让人窒息的环境中，焦虑万分。

文革过去已四十载，六四也过去了十七年，时间的沉淀让人成熟、宽容、睿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还得感谢我大学教哲学的政治老师，在我写了一篇愤怒悲观的学期作业后找我谈话，只简单地说了句要我多读历史，人可开朗。我转过很多学校，也受业于众多教师，听过无数教导（很多是谎言和废话），但铭记的老师和教导只有几个和几句，大学政治老师和他的话就是最深刻的。现在再来看文革就有了历史的参照，多了洞察，少了个人恩怨。毕竟，我的文革经历是中国千千万万人中极普通的一例，而且远不是最惨烈的。

让我们为了避免悲剧在未来重演而回忆往事。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